

周光庆 著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

周光庆 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7.375字数：192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622—0195—1/H·18

印数：1—3000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吸取了中国古代和当代语言学家研究成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汉语词汇现象，论述了古汉语词汇学所应该包括的一系列问题，构拟了一个古汉语词汇学的框架。这在我国目前还只有训诂学，而没有古汉语词汇学的情况下，是一种新的尝试。

本书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材料的收集和运用，论证细致周密。本书可供语文教师、语言工作者参考，尤其是可作为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选修课的教材，也适合广大社会青年自修古汉语的需要。

序

我们的汉语从殷周时代起，就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词汇。当时人们使用的甲骨文和金文已有数量可观的古词汇。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5年编著的《甲骨文编》收入正编的字来统计，已有1723个字。又据容庚1959年增订的《金文编》收入正编的字来统计，也有1894个字。那些字绝大多数都是单音节词。春秋战国以后，汉语词汇的发展更加迅猛，它的数量更加巨大，这是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我们炎黄子孙不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汉语词汇，而且在汉语词汇的编纂和研究中也做出很大的成绩、很大的贡献：

第一，编了许多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有《史籀篇》十五篇，相传是周宣王太史编的。其书久已佚失。据后人推测，是辑录当时汉语词汇，编成韵语，以便学童颂读的识字课本。这既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什么条理，又不曾给书中词语注音释义，讲解文字结构，算不了科学著作，但它在教学童识字方面有了成就，而且为后来汉语词汇的编辑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不应该一笔抹杀。后来秦代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都是仿照《史籀篇》而作，不仅便于学童颂习汉语词汇，而且贯彻了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起到了正字作用，这也是不可抹杀的。这种词汇汇编传到汉代，汉代语文学家也仿照着编写《凡将篇》（司马相如撰）、《急就篇》（史游撰）、《元尚篇》（李长撰）、《训纂篇》（杨雄撰）、《滂喜篇》（贾逵撰）等书，记录了当时汉语的部分语汇，也不可抹杀。只可惜除《急就篇》外，都佚失了。

第二，创立了词典、字书。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是汉初人著的《尔雅》。继起而作的有《小尔雅》，作者也是西汉人，稍晚又出现

了杨雄的《方言》，东汉末年又有刘熙的《释名》，魏有张揖的《广雅》。后来编词典的亦代不乏人。

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后来有张揖的《难字》、晋葛洪的《要用字苑》、吕忱的《字林》、陈顾野王的《玉篇》等。

目录学家常把《尔雅》一类词典归入训诂，《说文解字》一类归入字书。其实无论词典也好，字书也好，都是词汇的记录，不过有的记录全面，有的记录只限于某一方面。前者如《尔雅》、《说文》，后者如《难字》、《要用字苑》。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要充分利用这些词典、字书来弄清楚汉语词汇的各种情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第三，扩大了词汇。从上述各种词典、字书，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其中有长期使用的基本词汇，历代新造的词语；书面语的词语，口头语的词语，全民族的词汇，方言的词汇，有雅言，俚语，有本族的词语，有从异族、异国吸收过来的借词。真是兼包并蓄，无所不有，如果我们对此加以继承和利用，就能丰富我们的词汇。

第四，讲究构词方法。汉语的构词法，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战国时期，荀卿曾有详细的论述，见于他的《正名篇》。他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这就是说，一个单音节词可以表明事物的意思，就用一个单音节词；一个单音节词不能表明事物的意思，就用复音节词。这就是汉语的构词法，后来，人们一直是按照这种方法来构词的。但是古汉语词汇中单音节词比复音节词多得多，虽然不断增加复音节词，仍然避免不了同音词。于是中古以后常用改变声调或声母、韵母，以减少同音词。

第五，探讨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也就是训诂学所谓“事物得名之由”^①，东汉刘熙的《释名》开其先河，清代的段玉

^①参看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见《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

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绩。继起的学者有刘师培、杨树达等，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六，阐明词的音义关系。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这也是汉代学者已经认识到的。杨雄的《法言·问神篇》说过：“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序》也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说得更确切的则是清代戴震的《六书音韵表序》。他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语音和语义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语义是语音的内容，语音是语义的形式。二者密切结合，互相依存、不能分离。因此，我们又可以把语音叫做词的外部形式，和上面所说的词的内部形式互相对应。至于文字，则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和语义、语音也是互相依存，不能分离的。清代语言学者们多主张把形、音、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是正确的。

以上五项有关汉语词汇的整理和研究，如前所说，都是从周秦汉识字课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多半是有系统，有条理的，和那些识字课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从先秦到现在，我们语文学者在汉语词汇的编纂和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辉煌的。我们应当引以自豪。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也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理论开拓得还不够深。对古代汉语词汇的整理，特别是唐宋以来白话文词汇的编纂，还做得不够多，需要进一步整理研究、发扬光大。

光庆同志近几年来立志专攻古汉语词汇，广收博览前贤和国内外现代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并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初步构拟了一个古汉语词汇学的框架，运用长期积累的资料，细心进行论证，著为此书。我有幸得以先睹为快，很高兴地为它写了这一篇序。

周大璞

1987.10.20于武汉大学

绪 论

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事实上主要是由本民族文化的语言所决定的，因为正是语言使得民族能够构成其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名著《悲伤的热带》中阐述的如下的观点是富有启示意义的：“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到语言，而要谈到语言，就要谈到社会。”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仅见的延绵不断、高峰迭起的文化系统。古往今来，一切寻找民族出路、追求社会进步的中国的仁人志士，总要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反思它，探讨它。而要真正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它的重要的构成基础和表达形式——古代汉语。事实上，古代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实质上很多都是试图通过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去理解和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某种重大的基本的文化问题的。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是在探讨政治、哲学、逻辑问题的论辩中提出来的；汉代语言学的兴起主要是经学斗争的结果；清代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与汉学、宋学之争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戴震所谓的“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是当时学者们研究古代汉语的主要宗旨，表达了他们对先秦文化的价值评估和当时文化的建构理想。

随着对中国古代文化反思的不断进步，随着对古代汉语研究的深入和语言教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在古代汉语研究的领域里，词和词汇系统的考察、语义和语义系统的探讨，词汇学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当前的“重点工程。”这一认识的正确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学科理论方面。现代语言学认为，整个语言就是由词和词的

等价物即固定语组成的系统，语言只能分解为词语。所有的语言单位（语素、词、词组、句子）都是由词语来充当、构成的；语言的功能（思维功能、交际功能）也是以词语的功能为基础而实现的。儿童语言习得的事实也说明，人们语言能力的获得和大脑语言机构的建立，也是以词汇的习得为基础而完成的。至于语音，它本来就是词的物质形式；语法，它是词语的组织规则；文字，则是词的书写形式。所以，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就特别指出：“词是我们意识脱离不开的单位，是整个语言机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单位。”^①要研究一种语言，例如我们现在要研究古代汉语，最要紧的是必须首先考察和论证它的词汇。词在整个语言机构中的中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词汇论证和语义探讨在整个语言研究领域中的突出地位。

在社会语言学家眼里，语言是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媒介，而信息是由物理载体（语音）与语义两者构成的统一体。词，正是这种最小的“统一体”。所以，词语的意义内容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语言研究如果不依靠语义信息，就不能正确描写语言的结构属性和结构关系。心理语言学家也认为：无论是对言语的听辨和产生，还是对句子的记忆，语义都起了中心的作用；而语义又是和词相联系的。由此可见，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在语言研究的领域里研究词的特殊意义。

学科应用方面。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曾经指出：“一个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分类——一般是用语言来表示的——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生活方式改变了，分类就改变，语言也就随之改变。所以，语言所代表的分类是了解生活方式很重要的入手方式。”^②而语言学家丰克在《词的

①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第111页，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转引自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

②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63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来源和它们的传奇故事》中所使用的比喻则更为直接而生动地揭示了词汇研究的重大意义：“词汇也象个小窗户，通过它可以熟悉一个民族的过去。”^①古汉语词汇直接反映了古代汉族人民生活变化，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古汉语词汇这个“小窗户”，可以窥探我们民族遥远的过去。所以，古汉语词汇材料常常成为探索中国古代文化中某些问题的重要依据。比如，根据《周易·系辞》、《说卦》等典籍可以知道，古人称天为“乾”。闻一多先生在《周易义证类纂》中指出：“卦名之乾，本当为斡。斡者，转之类名，故星中北斗亦可曰斡。古人想像天随斗转，而以北斗为天之枢纽。……《天问》‘斡维焉系’犹《淮南子·天文篇》‘天维绝’矣。”这样，通过对名词“乾”的词源意义的探求，就能够从一个角度窥见到古人的宇宙观。在古人看来，天是一个日夜旋转不止的球面。《庄子·天运》所谓“天其运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己耶？”正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又如，甲骨卜辞中有“耜”、“耜”等词，历史学家由此可以探求商代农业奴隶进行耕作的基本方式；甲骨卜辞中还有“仓”、“康”等词，历史学家从中又可以看到商代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提高。名词“后”，甲骨文写作𠂔，本义是生育了本族全部子孙的尊母。到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以后，“后”的词义也随之引申为指称部落、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即帝王和诸侯，从这一词义演变过程中，历史学家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释名》中有“榻登”，刘熙释为：“榻登，施大床之前，小床之上，所以榻登也。”《三国志·魏志·乌桓传》注中也有这个词，写作“𦉑𦉑”。《魏略》解释说：“大秦国以羊毛木皮，作𦉑𦉑之属，有五色九色。”通过研究，语言学家发现“𦉑𦉑（榻登）”一词源出中古波斯语，意思

①转引自张永言《词汇学简论》第7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是榻上的毛席。语言学家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历史学家所利用，他们由此看到了汉代毛皮的输入，看到了两汉和西域各国以及波斯的经济往来^①。再比如，春秋时代以前，汉语词汇中有关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词语占有极大的比重，而抽象名词，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汇，所占的比重很小。到了战国时代，汉语词汇大大增加，虚词也都基本产生了。从词汇的这一变化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某种进步和人们思维能力某些方面的提高。总之，即使仅仅就古汉语词汇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而言，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

学科历史与现状方面。本来，在我国，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不过，它只是包含在训诂学中。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国语》、《左传》等书就已多次记载了古人对词义的辨析和训释；墨子、荀子等人就已提出了关于词的理论的几项重要论点；稍后，历史上第一部运用类概念区分词语的词典《尔雅》就已诞生了。到了西汉东汉时代，象《毛诗诂训传》、《毛诗笺》、《孟子章句》等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解释经籍词义的著作产生了，汉语方言学的奠基之作《方言》问世了，探求词的本义的巨著《说文解字》写成了，中国词源学的第一部专著《释名》出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在中国的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和辉煌的成绩。

然而，我们也毋庸讳言：诸子关于词的理论的探讨，是因古代名学的发展而开始进行的；《尔雅》、《毛诗诂训传》等书主要是为解经服务的，而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诸子关于词的理论的探讨，扬雄关于方言和词义的研究，刘熙关于词源的考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最终只能包含在训诂学中，而训诂学两千年来又常常是经学

^①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的附庸，直到清代乾嘉时期，正当欧洲一些语言学家采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求语言来源和亲属关系从而建立起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时候，我国的训诂学家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王引之等人，“冲破了字形的蔽翳，从有声语言本身观察词的形式”（王力语），就古音以求古义，归纳推求，引伸触类，终于把训诂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开始走上科学语言学的道路。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还是偏重考释古书词义，主要着眼于先秦儒家经传及诸子著作的词汇材料，“多蒐集编纂之功，而少归纳概括之力，理论的论述零零散散，原理性的东西往往淹没在材料之中”^①，并没有完全走出旧训诂学的圈子。清末以来，由于殷虚甲骨卜辞的发现和考释，由于大量的木简、泥封、铜器的出土和研究，中国的文字学有了飞跃的发展；由于欧洲语言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的音韵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语法学也开始发展起来。相对而言，只有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科体系。直到前几年，还有学者焦急地指出：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严格说来，这还是一块需要我们用辛勤的劳动进一步开垦的荒地。”^②

总之，无论从学科理论上，还是从学科应用上看，还是从学科的历史和现状看，在古代汉语研究的领域里，词汇的研究、语义的探讨，词汇学体系的建立，都应该是当前的“重点工程”。

要建设好这项“重点工程”，我认为，首先要大力开展对古代汉语代表著作词汇的研究，并编写出专书词典；开展对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个历史和断代词汇历史的研究，以期从总体上把握古汉语词汇的本质特征。同时，还要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词汇的变化，从词汇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共变”中

①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第1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去认识古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和演变规律。此外,还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全面地总结并借鉴传统的训诂学对于古汉语词义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深入地开展有关古汉语词汇理论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从而为真正建立起古汉语词汇学体系打下基础。一句话,要从传统的训诂学走向现代的古汉语词汇学。

古汉语词汇学是以古代汉语词和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它属于历史词汇学的范畴。根据古代汉语词和词汇所具有的不同于现代汉语词和词汇的特性,根据我国现阶段汉语规范化、语文教学以及文学、史学研究的需要,我们初步设想,古汉语词汇学可以着重研究:古汉语词的音义关系,古汉语词汇的组成与发展,古汉语构词法,古汉语词义的构成与特性,古汉语词义演变的主要原因、方式和结果,古汉语词义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古人对词的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古汉语词汇学可以包括古汉语语义学和词源学。

要建立古汉语词汇学,需要众多的学人在以往的基础上,从各个领域进行细致的考察、深入的总结和大胆的探索;同时,还要切实改革语言教学工作,做好有关普及工作,使本学科的建设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后备力量。我愿意追随各位前辈学者和同辈学人之后,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竭尽绵薄之力。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古汉语词和词汇	(1)
第一节	词和词的语音形式.....	(1)
第二节	词的书写形式.....	(18)
第三节	词汇的组成与发展.....	(40)
第四节	古汉语构词方式.....	(68)
第二章	古汉语词义	(96)
第一节	词义的构成与特性.....	(96)
第二节	词义演变的原因和结果.....	(123)
第三节	词派生新义的主要方式.....	(148)
第四节	词义的组合.....	(174)
第五节	词义的聚合.....	(197)
后记		(222)

第一章 古汉语词和词汇

第一节 词和词的语音形式

一、对词的理解

一个认真研究语言的学者，在系统地考察一种语言的词汇的时候，他总是要碰到如何理解词的问题。所以，早自汉代以来，我国学者就在墨子、荀子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什么是词的问题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卓越的训诂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以下均称《说文》）中提出：“词，意内而言外也。”对他的这一观点，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作了很好的阐发：“有是意於内，因有是言於外谓之词。此语为全书之凡例……凡许之说字义，皆意内也，凡许之说形说声，皆言外也。”许慎认为，人有了需要交流的意思，就要用语言这种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有是意於内因有是言於外”；就一个词而言，词义是内容，语音和字形是形式，这就是所谓“意内而言外”。从《说文解字》全书看来，许慎的这个看法并不是孤立的一句话，而是他对某些词语解释的指导思想。所以段玉裁说“此语为全书之凡例”。比如，对于“各”这个词，他的解释就不是“异也”，而是“异词也”。段玉裁说的对，许氏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正是“异为意，各为言”，“异”是“各”的内容，“各”是“异”的形式。又如，他对“鲁”这个词的解释也不是“钝也”，而是“钝词也”。他着意要说明的，也还是“其词为鲁，其意为钝”。由此可见，许慎关于“词”的见解，虽然不是什么系统的理论，但至少是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可惜的是，在传统的训诂学中，许慎对于词

的先进认识，段玉裁对许慎观点的正确发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就不能不在实际上限制和影响了训诂学的发展。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确立和发展，人们对词作了积极的探讨，提出了各式各样关于词的定义。只是，他们往往习惯于只从语法的角度来探究什么是词，因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词的词汇性质，所以没有能从理论上完全解决好什么是词的问题，以至于使学者慨叹：“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词汇学的著作或者避开回答词是什么一种单位，或者只照搬语法学给词下的语法定义”^①。给词下一个语法定义，只是抓住了词的性质的一个方面，只把词理解为语法的单位，而词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方面却未得到充分的揭示，这对于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词和词汇的词汇学著作来说，都确实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不足。好在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词的认识在不断的进步，正趋向于统一。在这里，我们对词作这样的总体上的说明：因为词既是词汇的基本单位，又是语法构造的单位，所以，词是一种完备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是具有独立而确定的语音形式、表示稳定而单纯的意义内容、能够在语法规则支配下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言符号^②。简而言之，词就是形式、意义、功能和结构四位一体的语言符号。比如下面两组句子：

A组

- 1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
- 2 君其备禦三邻，慎守宝矣。（《左传·昭七年》）
- 3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 4 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二十五年》）
- 5 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史记·吴王濞传》）

B组

①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第1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这一说明及其在下文的运用，都参考了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中《论词的单位的确定》一文的意见。

1 乐必发於声音，形於动静，人之道也。（《礼记·乐记》）

2 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汉书·西南夷传》）

3 先知动静，而为之备。（《三国志·吴志·孙韶传》）

4 往者随军到荆州……粗闻足下动静。（《三国志·蜀志·

许靖传注引魏略》）

在以上两组句子里，有不少的词。其中，“慎”是一个词，“动静”也是一个词，都具有词的特性。它们分别是构成这些句子的建筑材料单位，没有它们和其他词，就不可能造出这些句子；它们各自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慎”的语音形式是一个固定的音节，在上古时期为“真”韵、“禅”母、去声^①，“动静”一词的语音形式是两个固定的音节；它们在句子中都分别表示一个单纯的、明确的、可感知的意义，比如，“慎”在A组例（1）中表示谨慎，在A组例（3）中表示慎重。“动静”在B组例（2）中表示情况；它们都能在语法支配下自由运用，比如，“慎”既可以与名词“辞”配搭，组成动宾词组，又可以修饰动词“言”，组成偏正词组。“动静”既可以与介词“於”组成介宾词组，又可以与动词“知”组合成动宾词组。它们都是最小的语言符号。作为造句的建筑材料单位，“慎”不能再作机械分解，这是一望而知的。至于“动静”，它在上述四个句子中所表示的意义都具有单纯性。也就是说，它所表示的意义都不是它的两个组成成分“动”和“静”的意义的相加联，它的内部没有意义上明晰的联结关系；恰恰相反，“动静”一词所表示的意义是“动”与“静”结合以后产生的新的意义，既不是“动”，也不是“静”，而是“情况”。所以，作为造句的建筑材料单位，“动静”也是不能再作机械分解的。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慎”是一个词，“动静”也是一个词。有了对词的这种认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A组例（5）中的“天”就不是一个词，“下”也不是

①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上古音分析皆取自此书，不另注。

一个词，“天下”才是一个词。A组例（4）中，“文辞”就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易·艮》）中，“动静”也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动”就是前面说的“行”，“静”就是前面说的“止”，它们各自的个性依然保持着，有意义上明晰的联结关系。

在研究古汉语的词和词汇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较多地从词汇学的角度观察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词。从词汇学角度认识词，往往是把一个词看作是一个用一定语音形式代表一定意义内容的定型的“音义结合体”。词要成为语言符号，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语音形式和一定的意义内容。没有语音，意义就没有表现的形式；没有意义，语音就没有符号的作用。所以，对于一个词来说，形式和内容是不能须臾分割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研究过程中把语音和语义分开来讨论，也不妨碍对语音或语义进行单方面的考察。只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在作结论的时候，始终不能忘记了词的形式和内容是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就把词这个“音义结合体”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暂时分开来谈谈。

在语音方面，词一般具有独立而确定的语音形式。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词一般都有固定的音节，各音节有固定的声、韵、调；另一方面是说，词在和别的语言单位的联接处（无论是前是后）一般会有或者可以具有小小的停顿。对于上古汉语词汇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单音词来说，它们的语音形式就是一个声、韵、调组成的固定音节。“慎”的语音形式就是一个固定的音节，这个音节又有固定的声，即“禅”母；韵，即“真”韵；调，即去声。对于在古汉语词汇中日益增多的双音词来说，它们的语音形式就是两个确定的音节。“动静”的语音形式就是两个确定的音节。在“动静”一词的内部，词素“动”在语音形式上没有独立性，在“动”与“静”两个词素之间，不存在或习惯上不可有任何停顿。而在语流中，“动静”的前后则一般会有或者可以具有小小的停顿。为什么词与词之间必然有或可以有停